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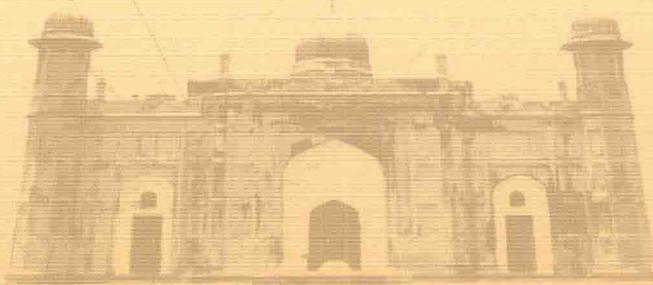


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丛书
何祖坤 主编

印度女性问题的历史沿革与现代演进

STUDY ON CONNECTIVITY IN BCIM ADJACENT REGION

蒋茂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丛书
何祖坤 主编

印度女性问题的 历史沿革与现代演进

STUDY ON CONNECTIVITY IN BCIM ADJACENT REGION

蒋茂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女性问题的历史沿革与现代演进 / 蒋茂霞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3

ISBN 978 - 7 - 5161 - 9942 - 8

I. ①印… II. ①蒋… III. ①妇女问题 - 研究 - 印度 IV. ①D735. 186.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213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王 影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32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丛书

编 委 会

编委会主任：何祖坤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加力	马 勇	王士录	王文成	王玉主
王国平	王崇理	邢广程	黄仁伟	叶海林
文富德	孔 灊	孔建勋	卢光盛	边明社
吕昭义	朱 立	朱振明	任 佳	任仕暄
庄国土	刘学成	刘 雅	孙士海	杨正权
杨福泉	李向阳	李晨阳	尚建宁	肖 宪
吴 磊	何祖坤	何 飞	何 平	何 跃
张瑞才	陈利君	郑晓云	赵干成	赵伯乐
贺圣达	殷永林	曹云华		

序　　言

南亚、东南亚地处亚洲大陆南部和东南部，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和阿富汗等八个国家，总面积约 500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7 亿。南亚次大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东濒孟加拉湾，西濒阿拉伯海，囊括了喜马拉雅山脉中、西段以南至印度洋之间的广大地域，是亚洲大陆除东亚地区以外的第二大区域。东南亚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菲律宾、文莱、东帝汶 11 个国家，面积约 457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5.6 亿。东南亚地区连接亚洲和大洋洲，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是东南亚的咽喉，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著名的湄公河，源自中国云南境内澜沧江，流入中南半岛，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注入南海，大致由西北流向东南。总长 4900 公里左右，流域总面积 81.1 万平方公里。

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是中国西向开放和周边外交战略的新布局，其战略指向是解决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西部大开发与大开放相结合，与沿线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南亚、东南亚及环印度洋地区位于亚欧陆上、海上交通通道的枢纽位置，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必经之地，是对我国西向方向开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周边地区，也是中国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以及“亲、诚、惠、容”外交理念的重要地区之一。

从历史交往和相互关系来看，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山水相依、人文相亲、守望相助，双方平等交往、相互反哺、互通有无的友好关系史绵延至今最少也有两千余年。在漫长的古代，依托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等连

通中缅印且贯通亚欧大陆的古老国际通道，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交往频繁、人员往来不断，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写下了一部互学互鉴，交相辉映的精彩华章。一方面，古蜀丝绸最早让南亚知道了中国，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诃婆罗多》及公元前2世纪的《摩奴法典》中都有“支那”产“丝”的记载。此外，考古学者还在四川三星堆遗址发现大量象牙，又在云南江川、晋宁等地春秋晚期至西汉中期墓葬中挖掘出大量海贝和金属制品。经考证，上述出土文物很可能是从古代印度输入的。这表明，古代中国与南亚之间的经贸交往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互动频繁。另一方面，在中国东晋高僧法显、唐代高僧玄奘的西行求经，天竺鸠摩罗什、达摩祖师的东来送法，以及南传上座部佛教从古印度经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此后再传播至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过程中，佛教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国和东南亚，并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据统计，从公元2世纪到12世纪的一千年间，中国翻译的南亚佛教经典著作多达1600种、共5700余卷。可以说，以“丝绸东去”和“佛陀西来”为典型，中华文明与南亚东南亚文明的交流互动，无论其内容还是规模，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均属罕见。

这些多条多向的古代国际通道，不仅是古代中国云南通往南亚、东南亚的交通通道，也是操藏缅语族、孟高棉语族等语言的古代诸民族的迁徙走廊。可以说，至迟自蜀身毒道的开通以来，途经云南或以云南为起点的多条多向通道，使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南半岛地区和孟中印缅毗邻地区较早产生了互联互通的历史萌芽，促进了中华文明、南亚文明与东南亚文明在漫长古代的整体互动。到了近现代，无论是滇越铁路，还是史迪威公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些在近现代交通史上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交通线路，无一不以云南为起点，而云南也正是凭借这些线路，在大湄公河地区和孟中印缅毗邻地区互联互通史上发挥了特殊作用并占据着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在我国西南边疆省区中率先提出了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对外开放战略。20世纪90年代，在国家加强西部大开发期间，又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建议。进入21世纪，云南着力推进绿色经济强省和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努力打造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经过多年的努力，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合作）、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BCIM合作）为代表，云南省在推动面向东南亚和南亚这两个战略方向的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中，走在了

全国的前列，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目前，云南是我国与南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开辟航线最多、国家级口岸最多、与周边国家连接的陆路通道最多、民间交流最频繁的省之一；也是泛亚铁路、亚洲公路网的覆盖地区，多条连接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规划路线通过云南走出中国。2013年，中国—南亚博览会永久落户云南省会昆明，云南获得了加强与南亚、东南亚、西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全面交流合作的新平台。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印期间，中印两国共同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云南学者最先提出的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构想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随着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云南将从边缘地区和“末梢”变为开放前沿和辐射中心，发展潜力大，发展空间广。希望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创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是对云南发展明确的新定位、赋予的新使命、提出的新要求。由于云南是中国西南方向与周边东南亚和南亚接壤和邻近国家最多的省，也是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地区开展经济合作最具区位优势的省。因此，云南理所当然担负着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周边外交的重任。

云南省委省政府为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加强顶层设计，九届十次全会作出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闯出跨越式发展路子的决定》，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全面推进跨越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云南的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云南的优势在“边”，困难也在“边”。如何在沿边开放中倒逼改革，在改革创新中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对接各国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共商、共建、共享经济走廊；准确研判国际形势和周边情势，都需要云南智库深入调研、长期跟踪地进行国别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区域合作问题研究，提出科学及有价值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为此，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依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了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这是云南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意见》的重要举措。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南亚东南亚研究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底蕴深厚、人才辈出。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外交部落实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报告》批示精神，在全国布局成立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就在我院成立了印巴研究室和东南亚研究室，经一代又一代社科专家的积淀和传承，发展成了现在的南亚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南亚东南亚研究是我院优势特色学科之一，在国内外享有较好的声誉和影响力，该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居领先地位。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院高度重视对我国和我省面向东南亚南亚对外开放、东南亚南亚国别问题和地区形势的研究。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区域合作战略、中国和印度经贸合作新战略、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战略、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东南亚南亚的历史与现状、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人文交流合作、印度洋地区研究等领域，推出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培养了一支专业从事东南亚南亚研究的学者队伍。

当前，云南省充分利用边疆省份的区位优势，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推出南亚·东南亚国情研究、“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专题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环印度洋地区研究等组成的书系，深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地理生态环境，以及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环印度洋地区的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非传统安全合作等问题的研究，推出一批成果，使广大读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以期对政府、学界、商界等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政策沟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商、共建、共享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所裨益。

任 佳

2015 年 10 月 25 日

前　　言

2007年，我有幸前往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其间，我观察到了一些社会现象——某些运输工具拒绝搭载一些男性和女性乘客；女性参与示威游行抗议洋葱价格上涨；一些男性前往街边的茶摊喝茶时，会把鞋脱在店外后赤脚进入店内，且店主给他们使用的茶杯有别于另外一些茶客所使用的茶杯；在拉贾斯坦邦等北方地区，穿着纱丽的女子在见到陌生男性时，通常会用纱丽的一角遮面或覆头；陌生男性故意碰撞单身女性；女性头上顶着很重的水罐……它们触发了笔者对其背后所折射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思考，继而最终把观察视角落在了印度女性的身上。

在本书的章节划分中笔者借鉴了性别史的方法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观点。性别史注重从性别视角来分析两性差异。斯宾塞则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并有其发展的阶段。因此章节划分时遵循“历史时期（的划分）和历史事件对妇女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原则进行，时间设置为“印度独立前”，“1947年—1974年”，“1974年—现在”。其中印度于1947年建立世俗民主共和国，于1974年出版标志性报告《走向平等》，这在印度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笔者希望通过这种划分方法了解印度妇女在过去是被传统文化、宗教和男权所塑造的群体，要求她们具备温柔美好的道德品格，成为慈爱的母亲和温良的妻子，具有“和平”与“宁静”的象征意义；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席卷全球，人们的物欲、消费欲激增，女性形象在一动态发展过程中是否仍为他人所塑造？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影响女性形象的因素是什么？社会化进程中，女性的能动性是被关注还是被忽略？两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两性关系较之过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正文的写作中，笔者还借鉴了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卡尔·马克思的某些观

点以及冲突理论、推拉理论等。如在印度社会中，施行萨帝仪式的女性或者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而牺牲的女性都表现出杜尔凯姆强调的利他主义思想，即个人的发展、追求、利益等于自身已经毫无意义，需让位于社会传统或“大义”，只不过前者（施行萨帝仪式的女性）在很多时候是被动屈从的，而后者（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而牺牲的女性）则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愿。又如孔德认为社会学可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其中社会静力学关注的是社会关系，而社会动力学则关注社会发展的动力、方向等，反映到印度社会中，表现为女性处于动态发展的环境，自身亦是动态发展的，不论其所具有的思想还是其所参与的活动都是如此。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和文明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再如马克思认为人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因而存在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印度社会按照种姓、权力、宗教、阶层、性别等多重因素被进行了人为地划分，表现为社会的不平等与不公正，这就是冲突理论的直接体现。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文章结构以时间为序展开，但却不属于妇女史范畴。符号互动论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就如同符号，其能够让我们了解事物本身，也能够建议我们相应的行为，对其的研究要求我们把事物本身置入相应的文化语境中，并仔细观察与之有关联的社会活动，因此本书的写作旨在通过交叉研究，来力图展现各个时间段下与妇女相关的“社会背景或人文环境”、“热门话题或重大事件”、“两性差异”、“伦理道德及宗教习俗”、“印度女性的关注点”、“阶层和种姓利益”、“非政府组织和政府角色”以及妇女参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活动”等内容，让女性遭受、参与和创造的“事件本身”来客观反映女性问题的核心，客观描述两性关系，以及客观展现女性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需要强调的是，女性问题的复杂性正好契合了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研究方法，即任何单一的理论都难以对某种社会现象做出完整性地总结，不同社会现象及其所反映的不同社会问题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可能更为客观和贴切，因此交叉研究是必须和必要的。

第一章主要展现的是，尽管印度独立前的女性有过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宗教、文化、传统以及父权体制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致使印度女性长时间以来处境艰难，缺少自己的话语权，社会地位极其卑下。为合法化英政府的殖民统治，英国人引入了“文明使命”这一概念，且相信基督教和欧洲思想的传播必定会使印度摆脱目前蒙昧的状态并成功转型，女性亦可摆脱悲惨境遇并被成功救赎。在这种西方文明与本土传统观念交互碰

撞的背景下，印度的知识分子以及少数女性精英阶层开始反思与探究社会弊端与陋习，以及女性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从而开始了19世纪后半叶那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和宗教改革运动，涌现出了大批致力于弊端改革的改革团体和改革人士。遗憾的是，这些改革家因为身处父权特质和宗教文化被过度强调的背景下，故难以与正统印度教及他们所持有的传统理念彻底决裂，也不能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文环境，因此尽管他们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来重新定义两性关系，但定义的过程既不完整也不全面。

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1947年8月14日，印度建立世俗民主共和国。后于1949年11月立宪，承诺保护和加强印度妇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女性公民的权利首次在国家认可的规范性文本中被记录了下来。第24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明确1975年为“国际妇女年”。为了准备契合此次会议主题的报告，印度教育和社会福利部委派古哈委员会展开相应调研工作。标志性报告《走向平等》最终于1974年提交。报告指出，女性地位并未提升到女性所期望之程度。尽管政府积极举措保障妇女权益，女性自身亦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社会文化活动来推动自身角色的转化，然而男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绝对控制权及排他性必然导致许多有利于女性的具体措施难以落到实处，女性仍被排除在利益范围之外，扮演着从属性和辅助性角色。换句话说，“公民平等”与“性别平等”的承诺仅在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得以体现。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不可弥合，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未能享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公正。

第三章着眼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女性积极要求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赋权，并争取融入印度社会的发展主流，因而“赋权女性”成了1974年以后“社会性别主流化”所强调的主题。然而赋权意味着女性将掌控更多的权力资源，意味着男女权力结构及关系将发生变化，这势必必将对男性的权威、权力和特权等形成巨大的挑战。这也是缘何女性成功进入经济、文化等领域后，性别歧视、针对女性的暴力、劳动性别分工等现象仍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表现为男性在社会结构中仍占据主导性和统治性地位，女性价值及角色未获正确定义及定位。换句话说，尽管印度政府为推动女性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印度女性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难以确定实现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所需要的具体时间，印度政府及社会各阶层的责任依然任重道远。但不可否认的是，教育是助推女性融入知识型社会发展主流以及构建

现代女性新身份的重要媒介，女性在寻求赋权之路上有了更多的权利与机会，逐渐脱离了被边缘化和被隔离的命运，两性关系在悄然改变中。

最后，笔者要向亲爱的家人及云南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陈军军老师，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佳、陈铁军、陈利君、李向春、马勇、赵群等专家，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赵伯乐教授以及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袁春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此外，还要特别感谢杰拉尔丁·福布斯教授，她撰写的《近代印度妇女》向读者详尽地展现了印度妇女史的一个发展过程，这给予了我极大地启发，并成为该书撰写的一本重要素材；同时众多的印度学者丰富的本土知识及良好的文化修养亦给予了我种种帮助。正如同莫提默·J. 艾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在其著作《如何阅读一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只能从比我们‘更高杆’的人身上学习”。我想对于我来说，杰拉尔丁·福布斯教授及众多研究女性问题的学者就是那些“更高杆”的人。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难以克服写作中的疑难和困惑，也难有本书的付梓。另外，由于资料欠缺及个人水平有限，本书错误疏漏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蒋茂霞

目 录

第一章 独立前印度女性全息图	(1)
第一节 独立前印度女性发展概览	(1)
第二节 印度教圣典中的女性形象	(15)
第三节 “困在墙壁中”的印度女性	(21)
一 童婚	(21)
二 寡居	(25)
三 深闺	(29)
四 萨蒂	(31)
五 女婴谋杀及婚姻问题	(37)
六 神妓与舞女	(39)
第四节 19世纪的改革运动及改革家	(42)
第二章 政府的“平等”承诺在现实中难以实现	(54)
第一节 走向平等?	(54)
一 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55)
二 教育存在差异和挑战	(61)
三 女性遭受就业歧视	(62)
四 女性政治参与的重要性被“人为忽略”	(70)
第二节 促进女性发展的措施	(74)
一 国家战略鼓励和强调女性的参与及管理	(74)
二 规划项目帮助女性融入主流社会	(78)
三 法制保障利于促进性别平等及女性发展	(84)
第三节 法律是纸老虎?	(96)
第三章 现代化进程下的印度女性	(108)
第一节 女性与政治	(108)

一	席位预留与政治赋权	(109)
二	达利特女性及其参与的运动	(122)
三	妇女组织成为促进女性发展的重要载体	(130)
第二节 女性与经济		(137)
一	女性与农业	(138)
二	女性与第二产业	(144)
三	女性与服务业	(155)
四	贫民窟女性与印度的代孕产业	(161)
第三节 女性与文化		(172)
一	女性与教育	(173)
二	女性与婚姻家庭	(185)
三	针对女性的暴力	(190)

第一章

独立前印度女性全息图

19世纪前，尽管印度女性有过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宗教、文化、传统以及父权体制等诸多因素却交互作用，致使印度女性长时间以来处境艰难，社会地位极其卑下。1608年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先后在印度多地设立贸易据点，随着财富的掠夺和积累，东印度公司的政治野心随之膨胀。1857年，印度爆发了民族大起义，终结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至此印度被完全置于英帝国的直接统治之下。为合法化英政府的殖民统治，英国人引入了“文明使命”这一概念，且相信基督教和欧洲思想的传播必定会使印度摆脱目前蒙昧的状态并成功转型，印度妇女等弱势群体将随之得到救赎。在奥格本（W. F. Ogburn）看来，“滞后”或“不适应”或“发展的步履不一致”是一个社会发生社会变革的主因。因此，在殖民统治的体系下，印度人对这种外来的新理念和新制度进行了重塑和重组，在与之激烈交锋后，印度的知识分子开始对社会弊端进行反思与探究。从而开始了19世纪后半叶那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和宗教改革运动。然而这些改革家因为身处父权社会，故难以与正统印度教及其所持有的传统理念彻底决裂，也不能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文环境，因此尽管他们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重新定义两性关系，但定义的过程既不完整也不全面。

第一节 独立前印度女性发展概览

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以前，河流文明已经形成。根据考古挖掘发现，在印度河和拉维河（Ravi）两河河岸已经出现了达罗毗荼人（Dravidian，后称达萨瓦尔那人“Dasas”）文化。那时的妇女与男性一样忙碌，操持

煮饭、缝补等各种家务、带孩子以及纺线等，过着井然有序的生活。

公元前 2000 年—前 1500 年，雅利安人翻过喜马拉雅山口，在印度的五大河流域地区定居下来，结束了原有的游牧民族生活，过上了农耕生活。对于崇敬自然力量的他们来说，妇女受到极高的礼遇及赞美，常被喻作黎明、土地、河流、母亲、女神等。正如上古诗歌《梨俱吠陀》（*Rig Veda*）赞美女性如同犁田和河流一样神圣：

“噢，带来好运的犁田啊！祈求你，赐予我们财富和丰厚的收成！”

“愿因陀罗接受这犁田；愿普善（Pushan）带领她向前；愿她满溢着水，让我们年复一年谷物满仓。”

“印度河年轻而貌美——她的车马和衣物充足；她有着大量的黄金，衣物被其饰满！她有着丰厚的粮食、羊毛和草料，全身戴满甜美的鲜花。”^①

吠陀时代早期，在雅利安人积极进行领土扩张和政治扩张之时，急需大量人手，而印度妇女在农业（纺织、种植、喂养牲畜）和制造业（弓箭、船、篮子、布料）^② 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创造作用，因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在这段时期，女性富有学识，有财产继承权，可自主婚姻，可自由参与社会活动，寡妇被允许再婚及享有财产继承权，女性社会地位较高，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女祭司、女诗人、女学者等。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就曾强调女性只有在结束教育后，才可开始婚姻生活。古印度法律制定者阿帕斯塔姆巴（Apastamba）曾表述说：

当女性在路上行走时，所有的人都应该为她让路。^③

^① Rig Veda, quoted in The Story of Women of India, Padmini Sengupta, Indian Book Company New Delhi, 1974.

^② “Women and society—th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edited by Amit Kumar Gupta; Criterion Publications; First Published 1986.

^③ “Status of Women in Ancient India”; Prof. Indra, M. A.; Motilal Banarasidass Oriental Publishers and Booksellers; Second Revised Edition.

百道梵书（Satapatha Brahmana）也曾这样描述：

愿这些妇女（寡妇）不要承受寡居的苦痛。让这些妇女不再落泪，不再悲伤，穿戴者贵重的饰物进家。^①

吠陀后期，随着雅利安人的政治统治逐渐巩固，种姓制度^②也开始定型。在此期间，部分被征服地区的人口变成了统治者的奴隶和廉价的手工劳动者。虽然女性在家庭产业中的角色，诸如纺线和编织，没有改变，但由于生理体格的限制，这些被征服地区的人口逐渐取代了女性在制箭、造船、耕作等制造业和农业中的优势地位。致使女性“社会角色”被迫调整，从而只能更多地从事打扫、洗刷、喂养家畜等家务劳动，其经济地位随着社会产出的降低而降低，间接导致女性社会及家庭地位的下降。《梨俱吠陀》这样描述家庭生活，其中女性所承担的家庭义务及社会角色一目了然：

看呀，我是赞美诗的著作者，我的父亲是医师，我的母亲在石头上将谷物磨成粉。我们分别有着不同的事务。牛儿走向各处寻找食物，因此各司其职的我们祭拜你，哦苏摩（Soma）！我们为财富而祭拜你。^③

这一时期，童婚制度出现，迫使女性在青春期或接近青春期前就嫁为人妇，她们接受教育的机会也随之遭到剥夺。同时社会逐渐父系化，男子受到尊崇，其社会地位进一步强化，男孩较女孩更加珍贵的观念也流行开来。女性形象进一步被固定在生产工具、家庭主妇、夫家财产上，“女性是孕育生命的沃土，男人则是播撒生命的种子”。

^① Satapatha, Quoted in The Story of Women of India, Padmini Sengupta, Indian Book Company New Delhi, 1974.

^② 种姓制度也称瓦尔纳制度，意思是“颜色”。由于雅利安统治者皮肤较白，而被征服的当地人则皮肤黝黑，故而种姓制度源于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肤色的差异。

^③ Rig Veda, Quoted in The Story of Women of India, Padmini Sengupta, Indian Book Company New Delhi, 1974.